

## 提升五大中心功能 推动上海经济发展

□ 李平 吴滨

“十四五”我国将开启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新征程,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向纵深推进,上海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立足五大中心核心功能提升,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上海“十四五”发展的主要任务。

2019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强调,上海要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017年12月15日,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进一步明确了上海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十四五”我国将开启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新征程,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向纵深推进,上海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立足五大中心核心功能提升,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上海“十四五”发展的主要任务。

## 重振“上海制造”,增强国际经济中心的影响力

近年来,上海经济增速保持平稳,经济规模持续扩大,2018年经济总量跃居全球城市第六位。但制造业发展面临较大挑战,制造业比重出现较明显下降。保持适度的制造业规模不仅是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需要,也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

制造业发展必须以质量为基础,“上海制造”不仅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是高质量和高品质的象征,更代表着我国制造业的水平,重塑“上海制造”品牌是新时期上海制造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上海制造”要实现宏观高质量和微观高质量相结合,在产业整体发展层面,充分利用资源条件优势积极培育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端装备企业,主动承接国家高新技术及核心部件制造,加强对国外高科技生产企业引进力度、合理规划产业体系,确立上海在国际高端制造业中的核心地位;在微观制造层面,继承发扬“上海制造”追求卓越的品质,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建立高水平的质量标准体系,形成一批代表上海制造水平的优质产品。

## 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撑力

上海积聚了国内外众多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步上升,2018年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位居第五位。当前,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化,人民币国际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对于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 近年来,上海经济增速保持平稳,经济规模持续扩大

2018年经济总量 跃居全球城市 第六位



作为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中心,上海肩负着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职责。“十四五”期间,上海继续扩大金融交易规模的同时,应有计划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人民币在跨境交易中计价与结算,提高人民币定价权,积极开展新兴科技在金融领域应用示范,加强金融管理体制改革,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鼓励和支持金融产品创新。

## 积极汇集国内外优质品牌,提高国际贸易中心吸引力

上海一直以来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多年来的努力,上海进出口货物总量位居全球城市首位,确立了世界贸易中心地位,进一步优化环境,提高质量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重点。除了规模之外,高端品牌集聚是世界贸易中心的重要指标,世界著名的贸易中心均具有很高的品牌集聚度。“十四五”期间,上海应以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依托,加大对国际高端品牌的引进,逐步融入上海文化特色,打造具有东方特色的国际时尚之都,增强上海时尚消费的全球引领力;积极引入国内优质特色品牌产品,为国内企业的产品提供国际展示窗口,充分发挥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带动作用。全面推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积极推动管理制度创新,“先行先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

自由贸易模式,加大改革力度,优化贸易环境,建设高水平的贸易基础设施,努力使上海成为国际购物首选地。

## 完善航运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国际航运中心辐射力

多年来,无论是集装箱吞吐量,还是航空货运量,上海均位于世界城市的前列,国际航运的优势地位明显。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彰显了我们对外开放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特征。

“十四五”上海要更加充分发挥好“一带一路”桥头堡的作用,积极拓展“一带一路”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展全球航空和海运网络,提升机场、港口和铁路运输等基础设施水平,加强与国内主要地区的交通连接,全面提升运输能力和运输效率,强化连接全球、服务全国的枢纽功能。同时,积极推动新兴技术在航运领域的应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技术与航运的融合发展,着力提升航运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 加大创新生态的培育力度,全面激发科技创新驱动力

与上述四个中心相比,科技创新

中心的定位确立较晚,但科技创新中心非常具有新时期的特征,代表上海转型升级的方向。

科技创新不仅是上海在我国科技强国建设中城市功能的体现,而且也是上海整体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上海具有优越的科技创新条件,聚集了众多高水平的大学、科研机构和科技型企业,张江综合性国家科技中心高端科技资源汇集能力不断提升。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必须实现能力提升和机制完善相结合。

“十四五”期间,上海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科技资源汇聚的优势,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快重大科技装置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积极推动重大工程技术创新和关键技术创新,提升上海全球科技竞争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完善科研管理、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激励政策,探索科技金融新模式,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构建企业、科研机构、大学、中介服务机构良性互动,资金、人才、信息流动顺畅的创新生态系统,打造全球最具创新活力的城市,增强上海科技创新的吸引力,引领上海城市整体发展的转型升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蓄力量,催生许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每一次爆发式突破与指数级增长都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塑。成功抓住并激发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尤其是成功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重大契机,抢占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全球话语权,对推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 发展优势独特潜力巨大

当前,我国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实践优势。

首先,应全面深刻认识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大意义,以开放和引领的心态积极主动推进,提供一系列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其次,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与互联网经济历经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改革红利,已经形成市场化为核心基础、社会资本为主导的结构格局,这是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社会经济支撑和优势所在。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为原则,通过政府投资基金以及政府—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协同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尤其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与无限潜力。

最后,我国不仅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还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具有世界上规模庞大、门类齐全、产业配套较为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作为互联网应用创新大国,我国市场潜力巨大、人口众多、海量精准数据获取和生成成本较低、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应用空间尤为广阔。

## 困难与挑战不容忽视

一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相对滞后。尽管我国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位居世界前列,然而该领域的基础研发、核心算法、关键设备和高端芯片等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创新能力亟待提升,特别是重大原始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二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高端人才不占优势。有数据显示,我国仅有25%的人工智能关键人才拥有超过10年的资历,而美国约为50%。人工智能高端人才一般集中于互联网行业,而实体经济、制造业部门能够推动深度融合和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领军人才、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人工智能专业高端人才优势并不稳固。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对未来发展的学科引领和市场需求的敏感度还有待提高,对相关领域的前沿学科的学科建制、课程教学及人才储备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三是我国数据标准体系和安全防护体系发展较为滞后。当前,我国在数据挖掘、核心算法、数据质量、标准制定等方面相对滞后,特别是缺乏数据自主标准体系将制约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随着人工智能产品逐步运用到各种场景,在人类使用和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数字化资料、个人隐私和信息的安全隐患,以及带来的信息伦理等问题亟待解决。

四是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带来的就业替代压力。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甚至直接带来新的社会伦理挑战和社会精神焦虑等,亟待积极做好防范和应对工作。

## 找准发展新一代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第一,要完善健康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是基于创新群落与外部环境在不同机制作用下不断发展与进化的结果,其运行机制是系统内部各个组成要素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进行不断的相互作用与联系。包括市场主导优化决定资源配置机制,企业公平竞争,以竞争精神和现代市场契约精神促进各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及高质量发展。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等创新主体的自主性和协同创新功能,培育完善健康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第二,要重点突破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的瓶颈。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技术应用研发,以及公共数据中心、云计算、云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正视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上存在的差距,必须依靠我国自主创新,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第三,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转型。形成一批基于先进制造业基础上的智能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我国传统工业产业信息化程度较低,自动化智能化基础薄弱,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和高质量发展转型具有无限空间。后发优势可以更好克服路径依赖的保守模式,强力助推传统产业规划、设计、生产、流通、消费、维护等全流程生命周期的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智能化、一体化建设,实现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加强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人才培育,进一步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积极培育和引进人才,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尖端人才、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尤其是跨专业、学科、领域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充分尊重高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规律,不断完善人才政策激励机制的建设。同时在全社会提倡包容失败、允许尝试、终身学习、进行负责的创新、不断创造的“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

第五,深入研究伦理道德法律政策等相关问题。科学家、技术专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者应加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共建共创共享未来发展。进一步反思和探讨人工智能及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伦理道德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促进智能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法律体系建设。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

## 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重大契机

□ 张凤帆

## 创新政策体系 深化沿边开放

□ 杨荫凯 刘宏武 张治峰

沿边地区在我国对外开放大局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沿边地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为维护边疆繁荣稳定和服务国家开放大局作出重要贡献,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受自然、历史、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当前沿边地区在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繁荣、人才队伍支撑、设施连通完善、产业承接集聚等方面还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新时期,沿边地区要更加主动地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推动政策体系创新,补齐弱项短板,强化产业、人才和平台支撑,主动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

通过深入广西相关城市、口岸、园区及企业调研发现,我国当前沿边开放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就进一步深化沿边开放提出以下七项对策措施。

一是树立大沿边和大开放的新理念。沿边地区应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扩大开放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机遇意识,把沿边地区开放与沿海、沿江、“一带一路”等开放战略统筹起来,务实提升沿边地区的整体优势,在加强区域联动、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外来投资等方面主动作为。国家、省级、市县、对外开放平台等各个层面建立起相应的协商

机制,推动解决沿边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加大沿边省区发展战略和口岸建设规划的协调力度,坚持错位发展。

二是统筹规划建设对外开放平台。顺应对外开放趋势,统筹打造带动力强、开放度高,既有科学分工又密切合作的对外开放平台体系。国家和省级层面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边境合作区、边民互市区等各类开发开放平台,在战略定位、区域布局、建设时序、先行先试等方面加强统筹,推动形成合力。加大对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扩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支持力度,对平台建设给予专项支持。

三是建设系统完备的基础设施网络。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统筹建设连接内外的基础设施体系。结合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快推进边海联动、铁水联运。加快建设国际物流园和临港经济区,强化物流集聚功能,由海陆口岸为起点统一组织班列、班轮集中对外运输。加强大数据支撑,根据分析结果有针对性进行招商引资,以物流业引导制造业落地。重点加强沿边城市、口岸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各功能区之间的设施联通。完善口岸基础设施,实行进口“提前审结”模式,探索并推广凭祥中

国—东盟边境国检试验区的成功经验和“两国一检”通关新模式,加快理顺海关管理体制,简化手续办理流程,提高口岸通关效率。

四是实施更有针对性的沿边发展配套政策。系统比邻近国家的综合发展条件和招商引资政策,制定新时代沿边创新发展政策体系,针对不同地区提出各有侧重的配套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对沿边地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予以倾斜支持,在园区土地开发整理方面给予资金支持。在人才和劳动力政策方面,实施特殊政策支持引进紧缺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到沿边地区工作,支持国际人才管理改革试点。在边贸政策方面,放宽边民互市贸易产品原产地证明,进一步提高边民互市进口免税额度,为边民互市商品落地加工创造条件。在财税政策方面,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灵活采用项目资金、“以奖代补”、贷款贴息和竞争性资金分配等方式,支持沿边重点园区、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建设。支持有条件地市或社会资本发起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在金融政策方面,大力实施跨境金融改革和便民金融服务措施,推进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结构化融资产品等融资形式,不断拓宽项目融资渠道。

五是培育更有竞争力的沿边产业。依托沿边地区特殊优势,积极培育特色产业;利用口岸通道优势,大力发展边境贸易、矿产资源加工、农副产品加工、物流和电子商务等产业;利用当地农业转移人口和外籍务工人员优势,有针对性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沿边开放政策和平台优势,有选择地发展高端制造业。

六是构建沿边特色城镇体系。依托“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发挥沿边省区中心城市的支撑作用和口岸城市的通道作用,以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城镇、边境口岸等为载体,加强人口和产业集聚,不断提高对外合作能力。支持大型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培育一批特色边贸商贸小镇和边境城市边民互市市场。

七是加大脱贫攻坚力度。着力提高边境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力实施精准脱贫、精准扶贫,进一步改善边境地区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鼓励边民开展互市贸易,实现脱贫致富与边贸发展双赢。加强扶贫协作对接,引导东部地区企业精准结对帮扶。在推动边民贸易转型升级过程中,无论是公司、合作社、互助组,都要保证有一定数量的边民参加,使更多群众享受边境贸易红利。

本版编辑 李彦臻

美术编辑 高妍

电子邮箱 jrbjzk@163.com